

彭珮云:中国特色的人口控制之路(下)

马国川:以宣传教育为主,针对的就是那种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而提出来的吧?

彭珮云: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所以老百姓做出牺牲,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重。老百姓愿意多生孩子,这与政策要求不符,但不能简单地认为,想多生孩子就是思想落后,更不能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去强制。计划生育关系到千家万户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自觉参与和积极支持,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根本不可能。计划生育从根本上来说是移风易俗的思想革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才能使计划生育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所以,我们提出以宣传教育为主。由于一部分群众的生育意愿同国家对计划生育的要求有一定的矛盾,更需要对群众进行耐心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引导他们把国家利益和家庭、个人利益很好结合起来,逐步改变旧的婚育观念和习俗,树立实行计划生育的新风尚。

所谓“以避孕为主”,就是精心指导育龄妇女落实避孕措施,如果等到妇女怀孕后再动员她们采取补救措施,不但工作难度大,也不利于妇女身体健康。

马国川:为什么要提出“以经常性工作为主”?

彭珮云:八十年代县以上逐步建立了计划生育机构,但是广大农村基层工作相当薄弱,许多地方平时没有人做计划生育工作,只依赖上面派人来,一年搞几次突击。从各方抽一些人去做工作,主要是宣布一下政策,不

这么做就强行搞,还流行一句话,说“不通,三分钟,再不通就龙卷风”。这样做虽然也受到一些效果,但往往是“突击来了一阵风,突击过后又放松”。还有一些地方,村里没人做工作,上也放任自流,致使人口生育处于失控或半失控状况。基层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条件很差,工作人员数量少,水平不齐,待遇低,队伍很不稳定,经费紧张,设备缺乏。1989年,国家计生委积极争取有关部门为地方计划生育机构增加了8000名行政编制,并规定各乡(镇)应设一名属于行政编制的计划生育助理员,专门做计划生育工作。1993年机构改革时,我们积极争取中央明确规定县以上计划生育机构为必设机构。这一年,国务院还发出文件,要求在“八五”期间,为全国每个乡(镇)解决1-2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农转非”。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逐步组建了活跃在基层的计划生育行政管理、技术服务与群众工作三支队伍。到1997年底,全国乡镇以上计划生育专职人员已有40万。依靠这支队伍,做好经常性工作,使计划生育工作得以深入持久地开展。

“三结合”

马国川:1992年国家正式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之所以要实行计划生育,是因为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现在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人口控制也应当由市场调节。

彭珮云: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我的理解是,不论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为了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都必须实行计划生育。建立市场经济解决的是经济体制和运行体制问题,主要是以什么方式分配资源。这和人口生产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马国川:那么在新形势下,计划生育工作在工作思路有什么改革和转变?

彭珮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深入,大家感到,过去仅靠减缓人口增长速度解决人口问题,单纯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的方法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中共十四大后,我们就开始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制约与利益导向相结合的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这一时期,各地计划生育工作中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经验和探索,如安徽省金寨县和湖北省英山县的“贫困山区要致富,少生孩子多栽树”的经验,江苏省射阳县的“少生快富合作社”,盐城市的“少生快富文明工程”,吉林省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开展家政教育和与妇女“双学双比”相结合的活动;四川省旺苍县等地的扶贫与计划生育相结合的经验及德阳市开展“万名计生协会会员奔小康活动”等。1993年8月,我到吉林省调查计划生育工作,发现吉林农村计划生育工作走“三结合”之路的经验很好。

马国川:什么是“三结合”?

彭珮云:就是把计划生育工作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与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我认为,“三结合”的内涵十分丰富,既有计划生育的要求,也包含两个文明建设的要求,强调计划生育工作必须自觉地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贴

近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要把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农民家庭、个人的利益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与以往的计划生育工作方法相比,一是注重结合,二是把利益导向机制引入计划生育工作,在项目、资金、技术、物资、社会福利、待遇等方面,向计划生育的农户倾斜,给他们更多的物质利益。这样做符合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愿望,不仅能更好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而且对解决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将起来重要的作用。从吉林回来后,国家计生委向全国转发了吉林省农村计生工作走“三结合”之路的情况报告,开始普及推广“三结合”。

马国川:实践证明,“少生快富奔小康”这个口号对广大农民有强烈的吸引力。

彭珮云:计划生育工作只有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与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的要求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的愿望紧密结合,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所以,1994年我们又总结推广了江苏省盐城市引入利益导向机制,建立各种形式的少生快富合作经济组织,引导农民少生快富奔小康的经验;并联合10个部门发出了《关于做好农村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的通知》。1995年,我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三结合”经验交流会上提出,计划生育在工作思路和方法上必须实现两个转变,即由以往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导向与社会制

约相结合。短短几年间,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之路

马国川:您1988年到国家计生委工作,到1998年离开,整整当了10年国家计生委主任。国家国家统计局干部的数据,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988年的22.37%下降到1997年的16.57%,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88年的15.73%下降到1997年的10.06%,人口增长稳定下来了。

彭珮云:1989年之后生育率的稳定下降,是国家计生委准确理解和贯彻国家人口控制政策的结果。这十年就是探索一条路,探索怎么把计划生育领到一个比较正确的道路上去。我们基本上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

马国川:在世界上,中国控制人口增长的经验都是非常独特、具有借鉴意义的,但是国际上批评的声音也一直存在。

彭珮云:开始的时候批评确实不少,有的人就是不愿意中国发展,总是挑毛病,也有些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他们对我们的做法不赞同。我们不断地总结,也学习国家上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同时重视和加强对外宣传,在国际上树立中国计划生育的良好形象。所以现在国际上批评中国计划生育的声音现在多多了。后来联合国人口基金还颁发给我一个人“联合国特别贡献奖”,表彰我对人口的贡献。当然,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工作的肯定,更是对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肯定。

摘自《财经》微信公众号

将军是怎样炼成的

吴东峰



动出击,夜袭阳明堡飞机场,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震动全国,亦振奋全国。是役为一二九师抗战之首战胜利,亦为陈锡联将军独立指挥战斗之始。余见将军两次,将军从未提及,问之方答:“这一战没有打好。

第三章 战功(连载 20)

韩先楚上将:机动灵活,攻克定边
1936年5月,韩先楚将军率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途经宁夏定边。守敌马鸿逵一骑兵团依仗城堡,固守不出。将军策马绕城一圈,曰:“敌惧我歼,攻城可克。”正待攻城时,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来电:“置定边不顾,继续绕道前进。”将军置之不理,仍下令攻城,果克。彭总闻讯,大喜,发贺电曰:“你们机动灵活,攻克定边,庆祝胜利,防务移交宋、宋(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继续向盐池前进。”

吕正操上将:“抗战模范”威震冀中
1937年5月,吕正操将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将军率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部分,被日军包围于冀城城南之梅花镇,激战一昼夜,毙伤敌七百余人。其时,五十三军已退,将军受党组织指示,率部突围,北上冀中,开辟抗日根据地。途经晋县小樵镇小学时,宣布脱离东北军五十三军建制,改称人民自卫军,将军被推举为司令员。此后,吕正操将军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行署主任、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

吕正操将军率部抗日于冀中,减租减息,改善民生,建立政权,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尤以地道战、地雷战而闻名于世,数年即收复冀中二十余县城,将军所部由不到一万人发展为八路军之第三纵队。1940年3月4日,将军于十八集团军总直属队干部会上介绍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经验,时人誉之“抗战模范”、“冀中名将”。

陈锡联上将:夜袭阳明堡飞机场,击毁日军飞机二十四架

抗日战争时期,陈锡联将军历任八路军团长、副旅长、旅长、分区司令员等职,率部首战阳明堡,夜袭旧关镇,设伏响堂铺,大战狮脑山、破袭平汉路,屡建战功,威震太行。

1937年10月19日凌晨,时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的陈锡联将军率部主

一、不会打飞机,只知道拿铁锹砍,这能砍坏几架呀?二、一架飞机爆炸,其他飞机也跟着炸了,好多战士来不及跑,牺牲了。”将军继曰:“如果我那时对飞机了解得更多一点,就会用上汽油把它烧光,会干得更漂亮!”

贺炳炎上将:雁门关独手歼日寇
1937年10月,贺炳炎将军奉命率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一六团于代县雁门关伏击日军,毙伤日军五百多人,击毁汽车数十辆。是役,将军带头冲杀,以独手持枪与敌肉搏,捅死一日本兵。此役迟滞敌人对太原之进攻,有力地配合了忻口战役,受蒋介石的特别嘉奖和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陈再道上将:陈毅元帅称之为“再道之勇”

解放战争时期,陈再道将军率中原野战军二纵驰骋中原,围歼高魁庄,喋血郑庄寨,大战羊家集,屡建战功,陈毅元帅称之为“再道之勇”。

叶飞上将:打响郭村保卫战

1939年5月17日,叶飞将军率新四军挺进纵队假道而占郭村,韩德勤趁机鼓动二李(李明扬、李长江)攻打郭村。陈毅闻之危急,三次急电命叶飞:尽量避免与李冲突,切不可在郭村孤军御敌。将军复电陈毅,仍称支持保卫郭村。陈毅更急,回电曰:6月28日便衣渡江,一切候在我到再议。叶飞将军接电后未予理睬。6月28日,郭村保卫战打响。其时,陈毅已至新老洲,闻之大骂叶飞:“冒失鬼,初生之犊不畏虎。”又曰:“这下好啦,就等我收容你叶飞吧……”

7月2日,郭村保卫战胜利结束。李长江三次总攻,被歼三个团,仓皇而退。7月3日,陈毅至郭村,见叶飞将军,仍不悦,曰:“本来我是来骂你们的,但你们打了胜仗,我还有什么好讲的!”陈毅又谓叶飞:“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危险哪,如果打不赢,你要全军覆没的,懂不懂?”新中国成立后,郭村保卫战拍成电影,即《东进序曲》也。

23.隔壁搬来一户人家

我们班上共有50名左右的学生,基本上由蒋家巷的小孩组成,还有一部分是生活在海防路西康路转弯角的几幢青砖房子中的同学们,都是就近入学。那个时候对于学生上学还费了一番工夫,既要让孩子们准时上学,又不要让孩子发生意外。于是就采取集体排队上学的方式。我们蒋家巷的孩子在公安坊前的一块空地上集合,8点上课,7点30分,按照从矮到高,排着两路纵队,穿过蒋家巷(海防路391弄),到海防路口,左转到人和街,穿到安远路,右拐就到了学校。我在第二个学期被李老师选为班长,于是在最前面拉着两位女同学陈刘妹、周冠霞的手,一路走到安远路一小。好像整整三年都如此,后来大了才自由去学校。前几年我见到陈刘妹,开玩笑说,我是拉着你的手长大的。同学们都会意地笑起来。

每次排队上学之前,是孩子最开心的时候,因为在这里可以任意玩耍。这群孩子中,俞宏根常常在公安坊门口骑着他家旧传一辆小自行车,到处游逛,引得同学们羡慕不已。有的跳橡皮筋和跳绳,有的玩丢麻将牌,还有的则在一旁说着话。陶华卿最有吸引力,一批女学生簇拥在她的周围,她俨然像一个公主一般。小学毕业,我们这一班人都又集体进了向阳中学,高爱珍成为我们的班主任,直到送我们1970年去上山下乡。

“文革”前夕,我家隔壁搬来了一户人家。姓钱,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男主人老实巴交,每天早出晚归,工作非常忙碌,平时基本上看不到他。女主人是一位40多岁说一口常州口音的家庭主妇,衣着极为素朴。夏天只穿件旧旧松松的针织女式内衣,我的记忆中好像背上还有几个小小的无伤大雅的洞洞,冬天穿条厚重破旧的老棉袄。脚上永远拖着一双廉价的塑胶凉鞋。从外表上看不出他们是有钱人。比较能够显出钱家主妇与众不同的,是她张开时镶着金子的两颗门牙,和颈项下戴着一条黄金打造的鸡心项链,沉甸甸地晃动着。

他们家不虞吃穿,但是钱太太居然每天都要上附近工厂去拣煤渣回家,省下买煤球的钱。不管是烈日炎炎的夏日,还是寒风刺骨的冬天,每天傍晚,她提着一簸箕煤渣,拖着夕阳回家。双手虽然乌黑,那明晃晃的金鸡心却在颈下闪着光,与她咧开说话时的大金牙齿相互辉映。这种金色总是与手上煤渣的黑黢黢颜色不相称。

蒋家巷的人虽然文化程度都不高,也不算富裕,但是对于人物和行为的评判却有一定标准的。例如像钱太太戴着金项链去拣煤渣就被认为有悖常理,人们说她“戴金链条去拣煤渣,有点不登样”。“登样”是一个特殊的上海方言词,意思是端庄和谐,整体打扮得体。如果有人穿着一套西装,脚上一双老头式布鞋,走在马路上,那就被人叫“不登样”,一定要换上皮鞋才登样。

钱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儿子叫阿林,瘦瘦削削的,那时节正在读书复习考大学,每天在后门的小房间里温课,不太与人答话。新搬到一个地方总要受到“老土地”的排挤,这在蒋家巷的词汇中叫“新开豆腐店”,意思是刚刚开张,你得巴结巴结别人。蒋家巷人对待外来者也不例外,新搬到蒋家巷,要获得蒋家巷人的认同,还需要“新开豆腐店”的人花时间与蒋家巷人打成一片。

但是这家人却不一样,男人上班,女人拣煤渣,儿女们每天忙着功课读书,不太与邻居交往,没有什么“朋友淘”。不过阿林跟我不一样,因为我从小喜欢看,喜欢一些比较带有文化意味的事情。有一次在后门的弄堂里,阿林走出他长时间复习功课的房间,问我:“你知道茴香豆的茴有几种写法?”我正好看过鲁迅的小说《孔乙己》,知道这是他用孔乙己的问题来考我,于是就把这个问题答了。从此阿林对我另眼相看。在他温课累的时候,他也会经常跟我聊聊。我们就这样成为谈得来的大小朋友。

很快,考大学的热潮过去,接下来,要等录取通知书了。

消失的蒋家巷

吴琦幸

